



改革题材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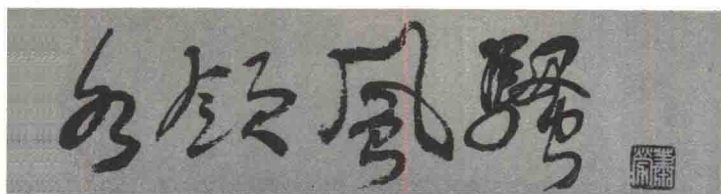
水岭风骚



王行人 刘蓓蓓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行人 刘蓓蓓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北京

各 领 风 骚

改革题材小说选

王行人 刘蓓蓓编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2 毫米 32开 印张 17.125 字数 358,000 插页 2

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3,500 册

书号 10228·118 定价 1.70 元

新时期的文学与改革者的脚步

(代 序)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这个集子，是反映新时期改革生活题材的几个中短篇小说。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把注意力转移和集中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随着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我们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就是新时期的文学。

新时期的文学，就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说，虽然它可以是反映新时期现实生活的，也可以是新时期的作家以新的时代精神俯视和表现其他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但是，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首要层次、重要构成和主要部分，却只能是反映新时期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新时期现实生活最突出最重要的社会内容，或者说新时期最根本最集中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深刻揭示的：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

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是牵动整个社会全局和每个社会机体的改革，因而也可以说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这种改革和革命构成并主宰了新时期的现实生活，同时也构成并决定了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社会内容。

难道不是这样吗？

激烈沸腾的时代变革生活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生动的创作素材。正是那些扣人心弦的“四化”建设生活和改革斗争生活吸引了广大作家的视听，使他们创作了足以反映我们伟大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正是那些挺身在“四化”建设和改革斗争中的英雄人物，用他们的丰功伟绩为新时期的文学谱写了最动人的英雄篇章，用他们雄健豪迈的步伐为新时期的文学走出了最坚实的第一行脚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作家选择时代，而是变革的时代生活赋予作家以创作激情；不是文学创造生活，而是激越的时代生活赋予文学以活力和生命。

同时，当我们看到时代生活对文学的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充分看到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正是在研究这些反映“四化”建设和改革斗争的文学现象的时候，我们又高兴地看到，那些活跃在文学作品中的“四化”建设的创业者和改革者形象，以他们的创业伟绩和改革壮举的思想力量和行动力量，以及作品生动感人的艺术力量和审美力量，影响和鼓舞着现实生活的亿万群众，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和行列中去，迈开改革的脚步，投身到“四化”

建设的现实生活，去为早日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选了这个集子。

二

在改革者的文学形象中，走在这个行列前面的或者说最早向我们走来的，恐怕要算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了。这个出现在一九七五年的人物形象，其思想锋芒和行动表现虽然主要是“企业整顿”，但他的这种“整顿”的实质其实就是改革，“整顿”企业中的“软懒散”实际上就是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包括管理方式、经营方式和各种制度在内的生产关系。可以说，他比较集中地反映和表达了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的理想、愿望和情绪。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及当时整个政治和思想还没有摆脱极左路线的桎梏，他的“整顿”和改革也就如同在实际生活中的遭遇一样，只能是理想和愿望而不可能得到实现。应该说，这是一场以“整顿”形式出现的改革之梦，虽然严酷的现实使它无由实现，但它却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希望之梦，一个振奋人心的理想之梦，一个有胆有识的信息之梦！

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正是从梦想开始的。而历史的新时期又为中国人民实现这种理想境界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这里，如果说王玉鑫《奇梦》里的那个纸盒厂透露出来的改革信息还仅仅是人们大梦初醒之后，晨空刚刚奏出催人起床的钟声的话，那么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则已经踏上了改革的征途而走马上任了。对于《奇梦》中的青年工人于

得水来说，他不满足于“厂里老是没有多少活，有了活又没人愿意干”的怪现象，他昼思夜想着改革，他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自己当了厂长，提出了一套《治厂方案》等等，的确够得上是一个奇特的梦幻。但他的《治厂方案》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他的改革活动受到了以权谋私者的要挟，则又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当于得水“梦醒”之后，整顿企业的改革喜讯立即到来了。因此，我们与其将这篇作品仅仅看成虚无飘渺的“奇梦”，不如说它是以梦幻的形式写现实，从梦幻走向现实的现实之作。

较之于得水，乔光朴改革的声威和气势要大得多，其战绩和成效也远比于得水显赫得多。乔光朴放着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的职务不干，却自愿请缨，毛遂自荐，甘愿出任多年完不成任务而又“大难杂处”的电机厂长，可说是目的明确，就是要来进行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的。他的手段和作风也与众不同一般，硬得很，坚决得很，可说是一个大刀阔斧的“铁腕”人物。当然他的改革也不能不受到一些因袭势力的阻挠、攻击、反对和诬陷。这里有来自一些干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有不可言说的权力之争，有来自一些不懂业务者的反对，也有不按操作规程生产的工人的捣蛋，等等。但是，对于锐意改革的乔光朴来说，这一切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改革，既然是一场深刻而又广泛的革命，它就注定要受到各种因袭势力的阻挠。但是能不能据此就得出历史上的一切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的结论呢？当然不能。在《乔厂长上任记》的续篇《乔厂长后传》中，不要说原来支持乔光朴的霍大道、石敢、童贞、郝望北等人继续支持他，给他以信心和力量；

就是原来跟他捣蛋或不理解他的人也转变了立场和态度，给他以新的动力和热情。不是吗？“鬼怪式”操作法的发明者杜兵已经投身到他的改革大军之中，而刚从技术服务队回厂的老钳工马长友针对一些流言蜚语也说：“乔厂长是属于电机厂的，是属于我们九千名职工的。我们工人拥护乔厂长……”工人们更是一片呐喊：“对！我们需要他，我们信他！”改革顺乎历史，合乎民意，这就是生活作出的结论，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何况这又是写进我们党的决议为举国上下所拥护的呢！

三

在经济改革中，扩大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自主权，开展生产单位与生产单位、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竞赛，对于调动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与劳动热情，对于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是至关重要和完全必须的。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实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里，闰水《竞争者》里的那个“在国内焊切行当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生产焊切工具的大厂厂长季国雄，在跟外地小厂厂长季明的“出口八千套割炬”的竞争中却令人难堪地失败了，小厂战胜了大厂，外地的战胜了本市的，年轻的击败了年老的，侄儿击败了叔父。但是这种竞争又是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的竞争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季明击败他的竞争对手——他的叔父季国雄——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卑弃大厂，

冷落自己的叔父，而是主动地跟叔父交流，跟自己的竞争对手切磋，希望双方取长补短，尽快“实现市场信息系统和雄厚的技术力量的联合”，果能如此，他们两厂都将“因此而强大十倍”。

在经济改革中，目前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人们开始认识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四化”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条件。不少作品对此作了相应的反映，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些人却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他们要么认为现在“老九上了天”，不能让知识分子管理生产，知识分子还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要么认为知识分子什么都行，重视知识分子就是让知识分子当领导，当随便什么样的领导。就不知知识分子学有专长，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在这方面干得好，玩得转，而在另一方面就不一定干得好，玩得转。这里，王金年《各领风骚》中的羊毛衫三厂的秦文川就是这么一位有学识、懂技术、为人正派而又颇有点知识分子“洁癖”的人。他人到中年，纺织学院六五年毕业生，是个“顶呱呱的工程师”，可是人们硬是推举他当了厂长。不错，他懂生产，懂技术，派人到外地向先进的同行们学习，向纺织局借钱购置新设备，抓技术改造，抓产品质量，取得了在本市同类产品竞争中的胜利。然而在产品的销售方面，他却一窍不通，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洁癖”去看待销售中的“生意经”，将做生意与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混为一谈；同时也不注意商品信息，或者说脑子里就根本不走这条神经。因此，他们的产品在更大范围的竞争中搁浅了，他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让位

给颇有点“生意经”和信息头脑的新任厂长“毛大头”。

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在现代的生产、销售的竞争中谁要是根本忘记或者完全丢弃了信息这个至关重要的执掇和枢纽，谁就失去了竞争的控制地位，谁就成了盲目的生产和销售。在“出口八千套割炬”的竞争中，季国雄的失败和季明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秦文川由于轻视“生意经”而导致在更大范围内竞争中的产品搁浅，以及“毛大头”由于坐阵市场从而获取了产品销售“行情”，其成败得失的内涵与实质也在这里。由此可见，信息对于现代的生产和销售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产品更新，干部更替，社会发展，势所必然。产品更新，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干部更替，是用其所能，目的也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清人赵冀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的是诗风变异数百年一变，而今天的物质生产、产品更新和干部更替的频率却大大加快了，根本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这里，透过季国雄的失败，季明的胜利，秦文川的卸职和“毛大头”的继任，透过他们各自工厂产销两事的升降浮沉的变化轨迹，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到我国工业生产发展和经济改革步伐正在飞速前进的动人情景吗？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这本小说集才选用《各领风骚》作为它的名字。

四

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生产关系的改革，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代之以适应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

但是由于各自原有的生产力基础水准的差异和具体情况的不同，这种伴随着生产力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它只能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可供我们照抄照搬。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在工业方面是如此，在农业方面尤其是这样。

这里，张贤亮《龙种》里的农场场长龙种是一种回答，张一弓《赵镏头的遗嘱》里的生产队长赵镏头是一种回答，而高晓声《蜂花》中的养蜂专业户苗果成、张静静两口子又是一种回答。在《龙种》里，当省农垦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孙大钧提出要给农场一套“价值一百五十万美金”的美国农机时，龙种并不十分高兴，他考虑的不是这个，他说：“现在，按马力来说，我们的农机已经不少了，可是生产还是上不去，年年赔钱，这问题显然不在机械化不足，而在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因此他的改革方案集中到一点，就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就是“把自主权直接下放给基层全体工人”。“把企业的经济权力交给生产劳动者”！其具体办法就是“打乱工人固定的工资级别，按定额从全队总工资当中领取报酬”。这里不是普通的农村，而是农场，不是一般的农民社员，而是农业工人，不是挣工分，而是拿工资。因此，龙种的这种改革办法更多地带有企业改革的性质和特点。

赵镏头领导的枣园一队则不同，是纯粹的农村生产队。因

此他的改革则纯属“土法上马”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了。这种办法叫“联产计酬”、“联产到劳”也好，叫“包产到户”、“土地承包”也好，或者干脆用赵镛头的话说叫“农民跟土地结婚”也好，反正是联产才能联心，地不联心地种不好，人不联产人不出力，要治穷致富，就得“叫人跟地对上象，连上感情，登记结婚”。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大多实行这种办法，可以说它在我国目前的农村中有更大的普遍性。

在研究农村改革题材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高兴地看到一种新型的农户（专业户）和新型的农民（专业技术农民）正在越来越多地闯进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来。高晓声《蜂花》里的养蜂能手苗果成和他的妻子张静静就是其中的一对青年男女。这种新型的农民，将“农工商”联为一体，因此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们不是“本分”的农民，而是“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点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父母也这样认为。这里，苗果成的父亲、教师苗顺新一再反对儿子养蜂，生怕苗果成把弟弟也带坏了，于是他连忙申请退休好让小儿子顶替，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一劳永逸的“铁饭碗”，虽不能说是“永世之基业”，但起码总算是一个“吃皇粮”、拿固定工资的职工了。但是无情的历史却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苗果成一年的收入竟大致抵得上他“十四五年的工资”。在事实面前，他傻了。当然苗顺新也不是一个不开窍的迂腐先生，巨大的收入不但打开了他的眼界，同时也不能不为之动心。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简单道理是：生产力的发展为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提供了前提和依据，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力的更大发

展，因此，这就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在这个问题上，龙种似乎表现他的过人的高明之处。他一方面坚定地实行改革，而另一方面又并不十分满意自己那里改革后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认为这种办法还是不科学的，“因为一个生产队就那么多的总工资，你分得多，他就分得少；并且，到一定时候，还会造成工人付出的劳动越多，他劳动力的价值越低的情况，所以，这种办法还需要改革。”就是说，改革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改革后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经常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固定模式，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的水平上。否则，改革者岂不成了因袭守旧者？但这是未来的问题，可以就此打住，这里就不详加论述和探讨了。

五

社会主义的创业者、改革家是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新人。就其思想内涵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新型的人；但就其外部表相来说，他们又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是凡人，而不是超人；他们是感情丰富的血肉之躯，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身玉体；他们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而不是凌驾于万人之上的万能的圣贤。

说到感情，人们认为大刀阔斧的乔光朴和严厉冷峻的龙种要算是骨里透硬的“铁腕人物”了。但是当他们走出会场而走到家庭问题面前，他们又变得情意绵绵了。乔光朴和龙种

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整，他们的妻子也都在这场“浩劫”中死去了。因而当倾慕乔光朴的女工程师童贞来到乔光朴的身旁时，这就不能不在乔光朴的心灵深处占据一定的位置，于是乔光朴不顾厂里的舆论压力，竟突然宣布跟童贞结婚。这是不是有点近于荒唐可笑呢？似乎如此，但是只要人们把他放在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的位置上去考察，似乎这一切又是不难理解的。同样，当龙种走进或者路过寡居多年的前任场长的妻子穆玉珊的茅屋时，龙种的心灵也不能平静。在穆玉珊的儿子迫于舆论的压力将龙种堵在路上，责问龙种为什么到他家去并宣布龙种为“不受欢迎的人”时，龙种回答说：“你问我为什么偏偏找你母亲聊吗？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爱她！”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也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清教徒，而在人的感情问题上恰恰和普通人一样。

说到能力，当然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但他们的才干和能力又是有限的。这里，不要说纸盒厂工人于得水不满厂里现状、思考改革而又只能把自己的改革方案寄于梦中是多么的无能为力；也不要说生产队长赵镢头在“左”的思想压力和恶势力的进攻面前只能以自杀和遗嘱的形式表示抗争，又是多么的束手无策！就说乔光朴、龙种这样的“铁腕人物”又怎么样呢？乔光朴在对厂里的改革和整顿确乎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却又毫无办法，虽然他不满足于这种拉关系走后门的“关系学”，但又不得不默许这种可怕现实。龙种也是如此，他虽然在对待工人闹事的问题上表现了“回天之力”，但在对待跟他平级的反对派郑福林之类人物的进攻问题上，却又只能扣帽子，上纲上线，以压服的办法来解决，似乎

也暴露了他办法不多的弱点。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中生活，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无不打上社会影响和社会制约的印记。诚然，秦文川被推举当了羊毛衫三厂的厂长是社会潮流所致，但是由于他的知识分子“洁癖”所导致的产品滞销的竞争失败，又何尝不是来自根深蒂固的社会原因呢？他对“生意经”不屑一顾，将“生意经”跟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混为一谈。然而这并不是秦文川的独创和首创，而是中国几千年来就一直存在着统治着的“轻商”、“抑商”的历史偏见和社会偏见对他自觉、不自觉的影响与熏染。同样的历史偏见和社会偏见在申请退休的教师苗顺新身上也有所反映和表现。苗顺新认为儿子养蜂是不务正业和没有根基，要让儿子们找一个端得牢的“铁饭碗”，也是来自这种深刻的悠久的历史偏见和社会偏见。因此，我们在考察这些人物（不论是改革者，还是因袭者）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的伦理的评价，而同时更要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去衡量，从而找出他们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化中的位置。

六

此外需要说及的是，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还常常被作品中改革者形象深刻的思想穿透力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所折服，常常为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政治嗅觉而赞叹不已，致使我们在分析和评价作品及其人物形象时，都深感自己的不足，而无从下手。作品及其人物的思想深度和政治敏锐程度来源于作者的思想深度和政治敏锐程度，来源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

熟悉程度和认识程度。而这一点，恰恰是评论工作者（不是一切评论工作者，而是如同我们这样的评论工作者）所不及作者的，因为评论工作者（似乎不仅我们这样的评论工作者，也包括其他评论工作者）不象作者那样长期地执着地活跃在惊心动魄的生活之中，不象作者那样跟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保持那样近距离的生活联系。在这个问题上，蒋子龙是如此，张贤亮是如此，高晓声和张一弓也是这样。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这些作品都是无可挑剔的尽善尽美之作。不是。也不意味着我们看不出这些作品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当然不是。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在充分估计它们思想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它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缺陷与不足。

思想上。我们可以认为闰水的《竞争者》通过自己的人物形象所阐明的思想在于解脱捆绑在企业身上的绳索，在于呼唤企业的自主权，在于赞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竞争，以及强调信息在生产与销售乃至其他领域中的作用与价值，等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揭示我国企业跟外商的出口谈判和外贸活动中，我们的这种企业自主权的权限和范围究竟有多大？有没有一个政策界限？这一点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艺术上。我们可以认为张一弓的《赵镏头的遗嘱》通过自己人物的悲剧命运所要揭示的农村改革及其阻力的思想意蕴是达到了，从而也较好地完成了它的艺术目的。但是赵镏头的死似乎又是牵强的。虽然他面临着“左”的思想压力和恶势力的诬陷，他的处境极其恶劣，然而这并不足以使他非死不

可。因为赵锺头的处境毕竟跟李铜钟的时代不同，更何况他的改革还有县委书记林慧和那么多的忠勇百姓的支持呢？而从整个作品来看，虽然作品充满着一个农民作家的精采风趣的描述，但又感到这种描述跟人物似贴似不贴，不是执着地站在现实的土地上，而是有点飘浮之感。

作品的成败得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还需要细心的读者朋友在阅读的过程中细加咀嚼、品尝和体味。

王行人 刘蓓蓓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于京华